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 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研究 ——以广西为例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s under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 Taking Guangxi as an Example

熊 娜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承蒙广西沿边沿海经济开放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经费资助出版。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 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研究 ——以广西为例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s under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 Taking Guangxi as an Example

熊 娜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广西为例/熊娜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 - 7 - 5096 - 4154 - 5

I. ①精… II. ①熊… III. ①农业—社会服务—研究—广西 IV. ①F32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053 号

组稿编辑：曹 靖

责任编辑：曹 靖

责任印制：黄章平

责任校对：赵天宇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www.E-mp.com.cn

电 话：(010) 51915602

印 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 × 1000mm/16

印 张：12.25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96 - 4154 - 5

定 价：5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序

构建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对于农业实现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以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概念为基础，拓宽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内涵和外延；采用非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政府、市场主体和农户三方主体进行博弈分析，提出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根据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建立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用该体系对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绩效评级指标转化变量，运用双层线性模型测度了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导入数学期望统计指标，根据双层线性模型回归系数计算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影响因素的优先序。

做研究贵在求实创新，贵在成果富有价值。我认为，本研究采取的方法体现了求实的精神，研究方法和结论均有创新，研究的价值又显而易见。因此，向读者推荐此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
党组书记、副厅长 郭绪全
2015 年 12 月

前言

2020 年是我国第一个百年的收官之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面小康是要惠及 13 亿人民的全面小康。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脱贫是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距离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 5 年时间，确保 7000 多万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全部脱贫，扶贫工作十分紧迫。未来我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重要的任务和重大的责任。打好新形势下扶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实现精准扶贫要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从产业空间布局看，农业产业是我国扶贫产业的主要产业。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共享程度低，扶贫信息自动化建设严重落后于需求。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把新型农业作为精准扶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创新农业发展模式，优化农业发展路径，引进农业新科技新技术，强化农业产业特色。新型农业包括设施农业、无土农业、特色农业、包装农业、彩色农业、知识农业、精准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等。加快建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是推动贫困地区新型农业发展重要途径。

本书以广西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综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帕累托次优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理论和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等多维视角，评价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技术测度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构建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框架，并通过借鉴国外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路。

本书由四部分八章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第二部分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理论部分,该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第三部分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部分,该部分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构成;第四部分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用部分,该部分由第七章和第八章构成。

导论部分包括国内外宏观经济动态、新型农业发展动态和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的背景、本书选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农业服务体系研究现状和进展、文献述评、写作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等部分。

第一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基础理论。该部分辨识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农村公共服务和农业公共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公共服务、农业服务和农业公共服务四组概念的差异;概述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组成、具体内容、供给模式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归纳总结了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服务论、非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供给均衡论等规范和实证分析的基础理论;描述了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以及调查设计和调查具体内容。

第二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主体分析。该部分以四大假说为前提,采用静态和动态三方非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在建设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政府参与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农户参与型、政府参与农户主导型四大建设模式。

第三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考察。该部分简单概述和分析了新型农业发展现状,详细阐述了农业政策制度、农业生产服务、农业市场服务、农业科技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发展服务和农业保障服务七部分建设现状,定性分析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现状形成的原因。

第四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该部分从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中,选择了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作为绩效评价法,根据绩效评价原则和理论依据设计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评价了广西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并分析了绩效评价结果。

第五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影响因素分析。该部分根据绩效评价结论采用双层线性模型,从8个第一预测变量和8个第二预测变量中识别出了农业信贷比、农业机械化指数等影响广西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因素。并对重要影响因素按照综合影响程度进行了优先序排序。

第六章是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框架。该部分阐述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框架创新的目的和意义,以此为基础结合新型农业公共服务建设的宏观经济背



景、建设现状和农情,提出了建设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建设思路和建设内容。

第七章是加快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该部分梳理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结合研究结论和建设框架,提出了包括农业科技、教育、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市场监管等关于农业生产基础服务建设和农业市场服务建设内容的政策思路。

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该部分总结了全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根据国际农产品贸易趋势、粮食安全、我国新型农业发展进程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创新包括五方面:

(1) 以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概念为基础,拓宽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内涵和外延。

(2) 采用非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政府、市场主体和农户三方主体进行博弈分析,探讨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

(3) 根据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建立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用该体系对广西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

(4) 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绩效评级指标转化变量,运用双层线性模型测度了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

(5) 导入数学期望统计指标,根据双层线性模型回归系数计算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影响因素的优先序。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精准扶贫战略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评述	4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
第五节 本书创新之处	14
第一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基础理论	16
第一节 公共服务核心概念辨识	16
第二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概述	22
第三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经济学理论	30
第四节 研究数据	37
第二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主体分析	40
第一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主体合作思想	40
第二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主体博弈分析	44
第三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模式	53
第三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考察	56
第一节 新型农业发展基本现状	56
第二节 农业制度服务建设现状	60
第三节 农业生产服务建设现状	69
第四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79

第四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	87
第一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概述	87
第二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设计	93
第三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	96
第五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103
第一节 影响因素技术测度模型与选择	103
第二节 变量设计、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105
第三节 影响因素技术测度和结果讨论	115
第四节 影响因素优先序及其结果分析	127
第六章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框架	129
第一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原则	130
第二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思路	133
第三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内容	136
第七章 加快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142
第一节 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142
第二节 加快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150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15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58
第二节 研究展望	159
附录一 农户调查问卷	161
附录二 农户访谈提纲	167
附录三 政府部门访谈提纲	169
参考文献	171
后记	184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精准扶贫战略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的转变，贫困人口较 1978 年减少了 6.7 亿人，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据 2014 年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贫困线是每人年收入 2300 元，也就是每人每天收入约 6.3 元。中国仍有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800 多个贫困县，12.8 万个贫困村，7017 万贫困人口，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 10% 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 500 万的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大，减贫效益递减问题开始突出，减贫幅度从 2010 年的 26.1% 下降到 2014 年的 14.9%，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刘永福，2015）。因此，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2020 年是我国第一个百年的收官之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面小康是要惠及 13 亿人民的全面小康。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脱贫是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距离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 5 年时间，确保 7000 多万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全部脱贫，扶贫工作十分紧迫。未来我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重要的任务和重大的责任。

精准扶贫意在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



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即通过“靶向疗法”,定位定向扶贫,总攻绝对贫困。虽然自2014年初推进至今,精准扶贫工作日渐机制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施精准扶贫的现实过程中,“脱靶”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实施扶贫新战略、精准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较大挑战和困难。习近平主席指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重在落实“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实现“六个精准”目标^①。

打好新形势下扶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实现精准扶贫要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紧密结合起来。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从产业空间布局看,农业产业是我国扶贫产业的主要产业。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共享程度低,扶贫信息自动化建设严重落后于需求。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把新型农业作为精准扶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创新农业发展模式,优化农业发展路径,引进农业新科技新技术,强化农业产业特色。新型农业包括设施农业、无土农业、特色农业、包装农业、彩色农业、知识农业、精准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等。

加快建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是推动贫困地区新型农业发展重要途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在深化责任农技推广制度基础上,按照提高市级、强化镇级、发展村级、延伸户级的总体要求,构建政府主导力、科技支撑力、农民主体力、社会参与力等“四力合一”的农业公共服务建设机制,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第二节 研究意义

新型农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种植以及经营,促使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精准化等特点^②。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农业建设的初级阶段,现有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于传统农业,成为新型农业发展的障碍,属于政府着力建设对象。因此,本书的选题意义在于:

^① 五个一批指: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六个精准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② 陈明星,《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11月。



（一）理论意义

（1）丰富了贫困治理理论和研究文献。在现有文献中，扶贫产业的发展问题是贫困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型农业。在扶贫脱贫研究框架中，集中分析了扶贫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模式、空间布局、转型升级等。本书将在精准扶贫战略下，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突出产业特色的新型农业，把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推动新型农业发展障碍性“源头”，深化拓展了精准扶贫战略中的产业治贫理论。

（2）丰富了农业增长理论。农业增长理论认为，农业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和科技三者。传统农业发展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形成粗放型发展路径，新型农业依靠科技重组和拓展生产要素而形成集约型发展路径。从如上理论看，农业发展假定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外生。国外农业现代化证明，农业公共服务体系随农业发展而发展，间接贡献于农业。本书假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内生以研究其对新型农业发展的治贫脱贫贡献。

（二）实践意义

（1）实现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顺利转型。新型农业建设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动中新型农业逐渐调整和优化结构。那么，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一个动态建设和完善过程；但是，“谁主谁辅”是战略选择性问题。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过渡阶段，实现农业转型依赖于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发挥主导作用；实现转型后，以新型农业发展建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辅助作用。

（2）改善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农业公共服务供需缺口日益扩大，使新型农业发展速度滞后于其他产业，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分割格局，这不仅不符合公共服务供给所应遵循的公平原则，而且使得新型农业跨越式发展化为“泡影”，客观上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财政分权视角研究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困境及成因，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and 对策，对于改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促进新型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

（3）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新型农业发展的阶段性产业结构和建设重点都有显著性差异。如新型农业发展初级阶段，注重科技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注重科技对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以建设基础设施为主要对象；中级阶段，以农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同时注重农产品及加工业安全生产，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以建设农村金融、农产品监管等为主要对象；高级阶段，农业生产注重生态和产业循环和谐化，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以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建设对象。在国家财力约束下，厘清农业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层次和抓住建设重点,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结构,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评述

随着新型农业的实践与发展以及学界对新型农业研究的深入,农业公共服务体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并已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的理论成果。

一、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现状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都是崇尚经济自由化的鼻祖,但他们的政府“守夜人”和个人“搭便车”思想仍然被视为公共产品理论的古典渊源。Hume 公共物品概念的公共服务包含公共产品和服务产品,而 Lindale 在论文中使用的“公共产品”一词标志着公共服务理论正式形成,他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林达尔均衡”思想^①。而为众多学者区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概念源于美国经济学家 Paul Anthony Samuelson。Paul Anthony Samuelson 认为,“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②。而私人物品是指“如果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照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人,而且对其他入没有产生外部效果”。Paul Anthony Samuelson 基于此进一步研究了公共服务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James McGill Buchanan 进而衍生出公用资源型和俱乐部型两类准公共服务。

而公共服务定义直到 2003 年才得以规范。Grout 和 Stevens (2003) 定义公共服务为为大量公民提供的服务,市场失灵使政府有理由参与生产、融资或监管各个环节服务活动。我国学者以此为理论支撑,将农村公共产品纳入了纯公共产品研究范畴,在马庆钰教授的私人产品公共物品化理论诞生之后,农村公共服务才被纳入了农村公共产品研究范畴。

2004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就是公共服务不公平问

^① Lindale 分析两个消费者共同纳税分担一件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时,指出每人在总税额中应纳份额应与他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享有的效用价值相等。这些税收份额即为他的税收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著名的“林达尔价格”,其形成的供求均衡被称为“林达尔均衡”。

^② Paul Anthony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Eighteenth Edition, McGraw-Hill, 2004-7-1.

题, Calderon 和 Serven (2004) 认为增加落后地区公共物品提供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提供质量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Louise C. Ivers (2008) 基于贫困现实研究, 指出医疗服务是提高农户生产生活质量关键因素, 认为提供医疗服务和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科技至关重要。CZR. Varma 通过对印度安得拉邦农村地区人口免疫覆盖率调研后, 肯定了 Louise C. Ivers 的结论。Wolfe (2007) 和 E. E. Nkwocha (2009) 对阿比亚洲农村调研后也认为医疗服务是影响农户生产生活重要因素, 并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进一步研究, 认为医疗服务是造成地区农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子。Laura Albareda (2007) 将上述农村公共服务不公平归咎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治理效率低下。他在给欧洲政府政策建议中写到“企业与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即成为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利益相关者, 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责任以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 Blank (2000) 却将其归咎于公共服务属性和特征。他明确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其他社会主体参与, 政府建设和治理公共服务的低效率不言而喻。Banerjee 和 Bjorkman (2006) 将其归咎于农户参与有限。他在文中批评政府: 信息化建设滞后造成农户公共服务信息非对称, 政府有责任改善这种现状, 而却不愿为之。他建议政府提高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 让农户公共需求意愿得以表达, 以此外逼政府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格局。

20 世纪 60 年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兴起和新制度主义学派理论的传播, 市场为经济学家研究公共产品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此获得理论性突破; Ronald Coase 的论文《经济学中的灯塔》被奉为这一视角的经典之作。在文中, Ronald Coase 通过对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公共产品的英国“灯塔”进行考察研究, 研究结论: 如此高的管理效率和利用效率归功于私人供给。1970 年, Demsetz 的研究结论与科斯的观点遥相呼应, 他的研究表明: 在能够不付费的情况下, 私人企业也能够高效供给公共产品。而后, 随着博弈论、试验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发展, 人们发现在众多公共产品领域内, 可以回避政府的强制行为, 即私人和社会团体也可以供给公共物品。1984 年, Comes 和 Sandler 通过长达 3 年研究, 指出公共产品的纳什均衡不等于零, 但小于帕累托供给, 其差距与人口数量呈正相关, 供给缺口与效用函数的特征有关。1986 年, Weisbrod 以英国 16 世纪私人资源组织慈善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实例论证了利他主义的来由。

国内学者对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关注起源于早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问题的研究。我国农经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公共品制度及供给等问题开始着手研究农村公共服务。按照研究内容分, 整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90~1999 年, 第二阶段是 2000~2002 年; 第三阶段是 2003 年到当前 (由于论文数量较多, 本书只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者)。



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阐述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缺口和质量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比较突出,一度使农业发展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张军为首的一批学者做出了不懈努力。1996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首次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前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并对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性经济学分析。叶兴庆(1997)、林万龙(2002)等在张军教授研究的基础上,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性问题,并以此提出了建设对策和建议。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再次成为学者探讨的热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与农村税费改革相联系,学者们致力于解决如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二是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矛盾性问题;三是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矛盾冲突问题;四是如何完善并强化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源问题。此外,还逐渐出现了城市支农和以工补农的相关研究成果。如黄佩华(2003)指出“财政中央集权”使得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负债累累,对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心有力,而力不足”。李琴、熊启泉(2005)和郭春丽(2006)却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失衡。他发文指出“尽管中央政府从全局考虑,有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动机;然而,地方政府动力不足,财力缺乏导致中央财政转移资金被挪用等等”。王谦(2008)通过对山东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考察,指出当前政府服务供给与农户生产生活需求总量和重点存在“双失衡”。钟裕民、刘克纤(2007)顺此思路,导入公共财政选择理论分析地方官员“经济人”行为,指出现有考核指标催生了地方官员建设偏好——政绩,这是导致地方政府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动力不足的本质原因。

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使学界关于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研究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一背景下的研究主要探讨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一体化等相关问题。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李成贵等研究机构和学者以统筹城乡为背景分析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采用财政补贴、完善保障制度等相关政策建议;其他许多学者对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公共服务做了大量的实证和规范性分析,都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源。

二、农业社会服务研究现状

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早已建设完善,满足农业生产和经营各方主体需要,为农业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换句话说,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历程。

从研究理论成果看,农业服务的主体效率、农业科技推广、农村金融服务等领域备受关注。Richard J. Sexton (1990) 认为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点是交易费用高;基于此论断,他研究了农业市场中的寡头垄断的价格行为、空间分布、行业地位,提出发展农业合作社将对市场中竞争对手的不合作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程度取决于包括合作成员数量、价格政策等农业服务体系结构和农业主体市场竞争力之间的关系。Andre P. Davidson、Munir Ahmad、Tanvir Ali (2001) 对巴基斯坦政府推行的农业公共服务私有化研究,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无论是谁都得依赖农户;不同之处是私人部门倾向于规模和投资大的农户,而这是市场机制的作用。Dina L. Umali 和 Lisa A. Schwartz (1994) 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包括家禽养殖、农资安全、农业销售等领域内的政府和私人主体的作用层面。他最近研究延续上述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影响私人机构推广农业服务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导入微观经济理论建立了农业服务推广模式的有效框架。John Farrington (2002) 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采用十年如一日单一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因为农业科技服务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重组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农户贫困性问题;同时指出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农业科技有助于农户脱贫。Pederson、Glenn Khitarishvili、Tamar (1997) 在总结中东欧和波罗的海等国家的农村金融现状、融资方式、信贷渠道等基础上,探索了农村金融中介和农业投资的隐性制约因素——农民农业低收益的态度和看法;提出了政府应通过银行“软约束”来建设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Volker Hoimann、John Lamers、Andre D. Kidd (2000) 从供给者和需求者双角度对德国 16 个地区的农业推广服务的组织和财政进行了研究,认为诱导农户广泛参与和改善融资条件可以提高服务质量。Peter J. Barry (2001) 使用衡量信用风险和风险来源风险模型分析了金融机构新办法下的风险资本管理,得出了以风险措施和最近发展的风险为基础的措施确定农业金融资本的供需缺口。Urutyan、Vardan Aleksandryan、Mariana Hovhannisyan、Vardges (2006) 研究亚美尼亚农村金融现状,认为强化农村信贷市场和完善金融机构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以此结论为假设,分析了美国营销部门在亚美尼亚实施的“农业信贷俱乐部”项目,预测了农村金融市场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Lawrence D. Smith 分析了农业服务领域分散化下的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作用和其分散化原因,提出了政府部门为私人部门给予政策支持以促进提高效率的建议。他于 2001 年又对政府职能部门是否需要权力分散化决策进行了政策分析,并结合农业技术推广、农业金融、兽医药等领域的分权化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2004 年 David J. Spielman 和 Klaus von Grebmer 认为当前涉农部门存在“抱团”约束性,假设存在激励机制,方能产生合作空间;否则只能降低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2005 年 M. Haitham、El Hourani 对美国农业服务领域政府



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比较分析,认为政府干预是农业社会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他通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进行规范性研究,指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应扮演“裁判”的角色,不应同时兼职“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角色,否则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功能逐渐弱化,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Ezatollah Karami、Rezaei Moghaddam K. (2005) 运用伊朗南部数据找出了促进农业合作社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组织机构、制度和政策。Csterberg Peter、Nilsson Jerker (2009) 假设合作社社员分为三类:合作社利润满意度、成员年龄和董事会经验,合作社运作成功程度由社员承担合作社义务和对董事会的信任衡量;采用该结社分析了瑞典 2250 个农户样本数据,研究结论表明社员承担的义务和对董事会信任程度取决于利润、社员的年龄和董事会的工作经验;加入农民参与管理工作变量后,大部分其他差异可以被解释,年龄仍然对董事会的信任存在部分关联,结果是年龄较大的农户缺乏信任。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使农村社会化服务建设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又一热点。邓瑶(2010)利用协同理论分析了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三螺旋模式,证明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服务体系,可形成政府、企业和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张娟、张笑寒(2011)认为多元化合作模式仅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产物。他们从社会化服务机理和演化路径论证了农业一体化社会化服务模式将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最优模式。而孔祥智、徐珍源(2010)则认为各种服务主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作用存在差异,但政府则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供给主体。刘晓光、董维春(2009)引入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农业服务体系已形成了既定发展路径。他们认为我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必须以现有格局和现状为基础,不可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拓展农业服务体系的内涵,加强农业服务领域专业性合作组织和区域性协调组织的建设。

龚继红和钟涨宝(2011)、李俏和张波(2011)、杨汇泉和朱启臻(2011)等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假设,对相关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实证分析。龚继红和钟涨宝通过对东、中、西部三县市农业开展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得出“农户对农业服务存在强烈的需求意愿,农户地域分布、购买方式、收入变化和文化等农户背景特征异质性的对农业服务购买意愿影响显著”的结论。李俏和张波(2011)利用陕西省9市18个乡镇74个村的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农户年龄、经营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人均纯收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区域位置等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显著”的结论。熊鹰(2010)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强烈未能得到有效满足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在管理体系、人员队伍、资金供给等存在问题。杨汇泉、朱启臻和梁怡